

若现若隐的关键词

观察当代文学的若干视角

刘卫东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若现若隐的关键词

观察现当代文学的若干视角

刘卫东——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若现若隐的关键词：观察现当代文学的若干视角 / 刘卫东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133-2044-3

I. ①若…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6706号

若现若隐的关键词：观察现当代文学的若干视角

刘卫东 著

责任编辑：汪欣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hakuna_陆壹

版式设计：魏丹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印刷：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本：660mm×970mm 1/16

印张：20.5

字数：282千字

版次：2016年5月第一版 2016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2044-3

定价：4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 | |
|---|-----|
| 底层文学论 | 001 |
| “底层文学” 向何处去? | 014 |
| “世俗价值” 的确立与知识分子的抵抗 ——考察新时期文学中知识分子话语变迁的一个视角 | 025 |
|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身份焦虑” 问题 | 035 |
| 论新世纪长篇小说中“大学叙事” 的不足与缺失 | 046 |
| “史诗型” 长篇小说的困境与出路 | 057 |
| 新世纪小说的民族化倾向 | 067 |
| 新世纪文学批评话语中的“新世纪文学” ——以《文艺争鸣》对“新世纪文学” 的建构为例 | 077 |
| 当代“鲁郭茅巴老曹” 与文学经典化 | 087 |
| 文坛“某某后” 表述质疑 | 098 |
| “群体心理学” 视角中“京派” 的文学活动 | 104 |
| 胡风案与“群体心理学” | 118 |
| 当代“地域书写” 与意义建构 | 128 |
| “地域传统” 与文化新变 | 139 |
| “女性文学” : 繁荣背后的危机 | 143 |

| | |
|--------------------------------|-----|
| “坏女孩”的身份问题及其文学史意义 | 153 |
| “道德”、“思想”与民族国家视角中的“身体写作” | 162 |
| 莫言论 | 170 |
| 王蒙论 | 223 |
| 冯骥才论 | 256 |
| 铁凝论 | 268 |
| 王朔论 | 295 |
| 海子论 | 309 |
| 后 记 | 319 |

底层文学论

一、“底层文学”的概念

“底层文学”^①是新世纪文学中关注和描写被称为“底层”的城市下岗工人、进城农民工、无正式职业的社会边缘人的生活的文学潮流，聚焦了这部分人的生活困境和精神状态，暴露了社会转型期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和官员贪腐等问题，表现出人道情怀和社会批判的主题。“底层文学”也存在过度消费苦难和精神指向乏力等质疑，并且存在表述中的身份界定问题，引起了“底层如何表述”等理论论争。

从它的词源上说，“底层”很早就被使用。据印度学者查特吉考证，在思想史范围内，“底层”概念最早来自葛兰西，一组研究南亚历史的学者的系列著作在1982年被冠以《底层研究》^②发表。文学中，高尔基的剧作《在底层》^③使用了“底层”的概念，描写了生活艰难的群体如体力劳动者、失业者、酗酒者、妓女的生活。上述“底层”虽然与本文所指的“底层”有若干相通之处，比如关注的对象和作者自身的立场等，但是毕竟语境不同，因此不能混淆使用。

新世纪以来，随着“底层文学”现象的凸显，理论界也相应对“底

① “底层文学”包含各种体裁的创作，其中的“打工诗歌”也具有广泛的影响，但是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小说。

② 【印】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

③ 【俄】高尔基：《在底层》，陆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层”和“底层文学”概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释。社会学研究者认为：“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年减少，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人员与产业工人。”^①这是从职业人员构成的角度解释底层的一个范例。文学研究者王晓华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界定“底层”概念：“1. 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路径；2. 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3. 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②这是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观察的结果。

虽然对“底层”的关注和表述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传统，“底层”的说法也被不断使用，但是并未形成“问题”，引起大规模的讨论，因此新世纪以前并未形成较为具有理论张力的“底层文学”的概念^③。就新世纪“底层文学”概念来说，文学界出现得较早的关于“底层”的讨论是《天涯》杂志2004年第4期发表的蔡翔、刘旭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一文。文学界较早关于底层的有影响的作品，是曹征路2004年发表于《当代》第4期的《那儿》。

“底层文学”产生及发展的背景比较复杂，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密切相关：1.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斐然，但是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比较突出，在经济层面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底层”，产生的物质生存、道德伦理问题亟待解决，引起各方严重关切，尤其是社会学研究者，较早介入了这一社会现象研究；2. 新时期以来，当代

^①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②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③关注和表述“底层”的文学作品从不缺乏，这个词也被不断使用，但是并未上升为概念。如熊正良2000年的作品《追上来啦》写一位父亲训练儿子长跑却没有钱让他去参赛，儿子在与父亲的不断对抗中逐渐成长。公仲在评论这部小说的时候使用了《对底层小人物的深情和关爱》的题目（中国小说学会编：《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文学一直保持着关注底层生存状态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们的日常生活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八十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和“现实主义冲击波”等流派都是这个传统的“当代”形式。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从反映现实和社会批判的视角，直接、真实书写了社会转型期底层的生活，是新时期现实主义传统的延续及发展。有论者将底层的传统置于更为狭窄的线索内，重新审视和发现“底层文学”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政治文化中的“左翼”资源的关系，试图有选择地挖掘、利用其中隐含的“现代”成分^①；3. 底层文学引起的论争涉及中国问题和道路，触及当代思想的敏感问题，因此引发思想、文化界的持续关注 and 讨论，而理论成果又对文学创作产生助推力，二者产生了明显的互动关系。

二、“底层文学”与“底层”生存

“凝视”底层生活状态，将底层恶劣的生活环境和低下的生活质量原生态地呈现出来，几乎是大多数底层文学的常规套路乃至终极追求。“底层文学”中常常出现逼仄、破败到触目惊心的生活场景，并以此作为故事发生背景，无奈、哀伤的悲剧氛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罗伟章的《我们的路》这样写春节前的工地：“遥远处发出尖厉的哨音，那是城里孩子在提前燃放烟火。工地离城区还有一段距离，哨音传过来的时候，只尖厉那么一下，就把世界丢进死灰一般的沉寂里。铁皮棚外是零乱的工地，除了一个看守材料的保安，恐怕见不到第二个人了。”这样描写自己的家：“卧室跟伙房一样零乱，墙角堆着土豆、红苕和锄头，墙上挂着蓑衣、斗笠乃至犁铧。这样的布局，使放在角落里的那张木床显得特别怪异。床上

^①邵燕君认为，“‘底层文学’的现状迫使我们认真思考有关‘社会主义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如果说‘工农兵文艺’的创作理念和生产体制已经解体，是否意味着其中的一些优秀传统也要被彻底地丢弃？能否经过改造得到继承？‘底层’故事，就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的故事。”邵燕君：“写什么”和“怎么写”——谈“底层文学”的困境兼及对纯文学的反思》，《扬子江评论》2006年第1期。

笼着蚊帐——这时候不是挡蚊子，而是挡风。屋子里无处不漏风。”刘庆邦的《神木》这样写车站的一角：“待着不动的是一些讨钱的乞丐。一个上年纪的老妇人跪伏成磕头状，花白的头发在地上披散得如一堆乱草，头前放着一只破旧的白茶缸子，里面扔着几个钢镚子和几张毛票。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坐在水泥地上，腿上放着一个仰躺着的小孩子。小孩子脸发白，闭着双眼，不知是病了，还是饿坏了。年轻女人面前也放着一只讨钱用的搪瓷缸子。人们来去匆匆，看见他们如看不见，很少有人往茶缸里丢钱。”“底层文学”中的场景描写，通常采取自然主义的手法，朴实无华，并且刻意渲染贫穷和悲惨，以激起读者的同情和愤慨。作品中经常设置对比元素，表现贫富之差和道德滑坡，形成对照，暗含的对现实的批判不言而喻。“底层文学”的贫穷书写夸张凌厉，酝酿了戏剧性冲突的情绪，为故事预设了较大的叙事空间和可以深入讨论的主题，但是也正因题材优势，很多“底层文学”反而受到牵制，盲目编造离奇的情节，陷入了黑幕、谴责小说的泥淖。

在“底层文学”中，进城农民工、下岗工人、无固定收入的毕业大学生（“蚁族”）、性工作者纷纷成为小说的主人公，“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小说展开的背景。他们是新世纪文学出现的新的一批“时代人物”，辛苦奔波，挣扎在温饱的边缘，时常为生存焦虑，有时候甚至为金钱铤而走险、触犯法律。作品的故事时间都是当下，有强烈的现实感，有的小说就是根据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改编。20世纪90年代文学固然有“新写实”这样的关注“小人物”的传统，也塑造了印家厚（池莉《烦恼人生》）等小人物，但是作品中的冲突仅限于个体的“烦恼”，而“底层文学”中的“小人物”被剥夺得更为彻底，生存更为困难，怨恨和反抗更为明显，因此很多作品都是以鲜血淋漓的凶杀案收场。“底层文学”中的“小人物”缺乏反思和表达能力，因此一直作为沉默的大多数被压抑，此次终于借助“底层文学”，集体亮相。《那儿》（曹征路）里写到一位下岗女职工杜月梅兼职暗娼：“杜师傅是那样一种人，每天早晨六七点就推着一辆小车，上头装着几个暖瓶，几袋面包蛋糕，穿白大褂戴大口罩满大街吆喝：

珍珠奶茶，热的！珍珠奶茶，热的！而到了夜里却换上一身时装，浓妆艳抹，十分青春地去霓虹灯下做哨兵。”《跑步穿过中关村》（徐则臣）的主人公敦煌是一个因为办假证而被抓起来的获释人员；《我们的路》（罗伟章）、《泥鳅》（尤凤伟）、《高兴》（贾平凹）的主人公都是进城农民工；刘庆邦的作品的主人公大都是小煤窑工人。统计一下可以发现，“底层文学”中包含了现实生活中最贫困、最缺乏尊严、最挣扎的一群人。

底层写作的作家大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希望自己能够“说真话”，反映时代声音，体现着启蒙作家的一贯立场。曹征路从民粹主义和反拨文学风习的角度肯定底层写作的意义：“肯定弱势群体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存在价值，赞美他们为尊严和自由而付出的所有努力，而不仅仅是满足少数精英权贵的趣味，这样的文学才是创造，才有存在的理由。”^①曹征路的基于民粹主义的说法铿锵有力，激动人心，但是也有可商榷之处。“底层”与“人民”概念不同，是一个不具备政治正确色彩的概念，并没有天然道德优势，因此，写底层和肯定底层也不等于天生具有价值合理性。有的“底层文学”迷恋对“底层”不幸、悲惨生活的描述，有故意夸大“苦难”以引起读者怜悯的目的，这一点已经被有的研究者觉察和批评^②。刘继明认为“底层文学”是“新左翼文学”，特征是“追求社会平等、反抗阶级压迫，以及对人民性的强调和现实批判立场”^③。将“底层文学”置于“左翼”文学视野内，可以强调阶级视角中底层书写的价值，但是却无法解释“左翼”文学的强烈政治诉求在“底层文学”中缺失的状况，而这正是“底层文学”与目前体制之间达成和解的结果。

底层文学中不乏暴力犯罪，或许这是作家想象中底层表达自我的最好方式。底层由于处于弱肉强食的食物链尾端，物质生活条件极度恶劣，因此为了生存的需要，常常不惜触犯法律和人性底线。从底层文学看，“逼上梁山”是一个常用模式。“逼上梁山”模式中，常常会有一个受到

①曹征路：《期待这个时代的大作家》，《深圳商报》2008年6月25日。

②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③刘继明：《新左翼文学与底层写作》，《湖北日报》2006年5月19日。

压迫的底层，然后有一个骄奢的压迫者，底层心理不平衡，忍无可忍，最终进行暴力反抗。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写“我”和九财叔两个挑夫随同寻找金矿的踏勘队进山，感受到物质条件的巨大差异和沟通不畅带来的仇恨后，九财叔激起了渴望金钱的罪恶本能，杀死了踏勘队的人，此后，竟然还要杀死“我”。《马嘶岭血案》写的是一桩恶性杀人案，也是“底层文学”中不多见的极端的冲突，但是唯其如此，才凸显出现实矛盾的尖锐和不可调和。陈应松把主要人物设置为挑夫和踏勘队，地点设置为人迹罕至的深山，实际上还是有意无意地削弱了批判现实的力度。在谈及这篇作品时，陈应松自己并未在意“反抗”，而是强调“个人的孤独”和“万念俱灰中的铤而走险”^①。《马嘶岭血案》写了底层的爆发和杀戮，但是也并未完全将原因归为阶级矛盾，而是细致入微地呈现了“九叔”的杀人念头是如何逐渐发生，最后在无法遏止的贪欲中失去理智。底层的出路是文本问题，更是现实问题，二者目前并不能达成一致。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也写到了底层与中产阶级的冲突，但是举重若轻地处理了反抗的问题。《谁能让我害羞》写一个送水工男孩与一位中产阶级女性由于误会发生了冲突，当他试图掏出刀子的时候，被她拿出一把假枪震慑住了，最后被及时赶到的110带走。一触即发的血案戏剧性地收场（本来就是戏剧），暴力的形式发生了微妙的转化，送水工尚未掏出反抗的武器，就束手就擒。女中产拿出的虽然是一把假枪，但是她却对这个“入室抢劫者”连扣了两次扳机——这预示着想象中的社会和谐破产。《谁能让我害羞》写了一次中产阶级和底层未及展开的冲突，但是背后隐藏着暴力（中产借助的是国家机器）对底层的压迫，而双方的隔膜和仇恨却更令人震惊。底层实施暴力犯罪的目标，更多时候也是底层，他们往往无力推动压在自己身上的重担，只好将其转嫁给比自己更为弱小的对象。刘庆邦曾经当过煤矿工人，他的题材也集中于煤窑的矿工，为这个特殊的群体书写了一部史诗。刘庆邦的《神木》（后被改编为电影《盲井》）写两人组团专

^①李云雷：《陈应松先生访谈》，《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5期。

门拐骗“点子”一起到煤窑干活，然后故意弄出事故，以家属的身份勒索矿主，已经多次作案成功。当其中一人赵上河对“点子”元凤鸣产生恻隐之心之后，方案无法实施，两人自相残杀，而“点子”元凤鸣最终逃脱。

《神木》不是针对底层的艰难生活，而是展现艰难生活催生下的人性中的残忍和无可逃避的黑暗。尽管小说中写到赵上河有陪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的打算，也在最后时刻良心未泯，但是正因如此，才显示出人性的多个侧面，没有把底层简化为用于道德判断的符号。《马嘶岭血案》《谁能让我害羞》《神木》等作品都涉及底层暴力问题，但是矛盾冲突的双方和解决方式各不相同，这正是从文学视角对底层这一概念的丰富和深化。

“底层如何救赎”是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必答题”。对于作家来说，只能指出伤痛，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但是无法从现实的层面给出一条出路。农民是底层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主人公，他们默默为城市奉献，却在现有的体制下被城市拒绝。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写底层农民宋家银以变态的说谎方式提高自己的身份，狂热追求城市的物质生活，为此她的丈夫常年在城里捡垃圾养家糊口，但是，他们却永远无法获得个人尊严。虽然不乏过度的虚荣心作怪，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宋家银是想获得更为“现代”的生活，不过这一理想却被自己的农村人身份所阻隔，因此她只能选取戕害自己和家人的方式。宋家银一心想改变命运，但是去了北京一趟后，发现“原以为城里千般都是好的，没想到农村人到城里这样低搭，是跪着讨生活的”，“城市是城里人的，你去城里打工，不管你受多少苦，出多大力，也不管你在城里干多少年，城市也不承认你，不接纳你”。贾平凹的《高兴》开端写刘高兴打算做西安人，和朋友五富来到西安打工，最终五富死去，尸体也没法运回老家安葬，老婆只能带回他的骨灰，继续待在城市的高兴陷入迷惘。类似的城乡对立表述，俯拾皆是，充斥于底层文学。

现实如此坚硬，只能无奈认同，底层文学的尴尬和脆弱可想而知。罗伟章在《我们的路》《大嫂谣》等作品中用知识分子“我”的视角观察底层，夹叙夹议，使作品呈现出“观念先行”的效果。现代作家一般刻意保持价值中立，罗伟章却有“故意”逆反的意味。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中

写“我”是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被拖欠工资、罚跪，饱尝艰辛，但是，“我”却没有说“不”的条件。“我”五年才回一次家，但年后又不得不离别哭泣的女儿和哀怨的老婆，踏上进城务工的路。小说最后写道：“我们都只能承受，必须承受。”诚然，对于底层来说，注定是这个博弈场域的失败者，一切皆为贫穷前定，别无选择。王祥夫的《花落水流红》写村子里的女孩没有出路，只能去城里当暗娼，虽然叶子极力抗拒，但是终究敌不过贫穷，也只好如此。曹征路的《霓虹》写倪红梅自己下岗、丈夫横死却得不到赔偿、婆婆瘫痪、女儿生病，为了生存她只能去卖身。底层文学的这种姿态中，包藏着作家深深的忧虑，因为对底层来说，现实的不公固然可怕，但是自己的无能为力却让人感到绝望。

三、底层文学与“表述”

新世纪文论界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非常热烈，核心是“底层”的身份和代言问题，基本还是质疑和讨论底层与底层文学的关系。具体而言，学界发生分歧的地方不是“底层”和“底层文学”的概念，而是“底层如何表述”和“如何表述底层”。

有的学者推出了身份为真正“底层”的作品，试图让底层说话。杨宏海主编了《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推出了大量“底层”作家的作品，展示、保留了底层的声音^①。这种努力有意识地突出了写作者本人的身份。有的来自底层的作家逐渐具有了较高的写作水平，进入了研究者视野，如郑小琼、周崇贤、王十月、浪淘沙、王怀岸、徐东、叶耳、张联等。由于学养、发表渠道、思考力等条件的限制，底层的自我表述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底层”更多写的是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悟，对自身身份和境遇追问的作品并不多，思考深度也不够。

^①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备忘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

有观点认为底层无法通过文学表述自己。南帆认为“底层文学”的作者值得分析：“来自底层的不一定代表底层。这表明底层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复杂交错。”^①因为底层文学的主要推动者和代表作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因此，“底层”与“底层写作”之间的复杂关联被学者意识到。有观点认为真正身份是底层的文化很难被概括。蔡翔认为“底层文学”不能成为一种思潮，“它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状态，没有任何的记录，都是自生自灭的，而且分散在各种文化或艺术形式当中。我觉得总结出这样一些特点是非常困难的。”^②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是毕竟底层文学已经是客观现实，应该从作品的角度概括和研究底层文学。有观点认为“底层”无法摆脱和只能接受被表述的命运：“‘底层’只不过是戏剧化了的一群人，他们永远沉默，尽管从来不缺乏‘代言人’”，“历来伟大的都是‘底层文学’，而不是‘底层人士’”^③。于是，底层发言的问题呈现出来：他们必须要通过一个中介。理论家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且给予了阐释：“无法发出声音的底层，沉默的底层最需要被表述”，“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④明确说出底层无法表述和表述的困境，而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通过知识分子。理论家固然有自己的解释，而底层文学针对上述问题，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二者之间，既有共识，也有龃龉之处。在底层文学中，不少作品都涉及底层表述的艰难。底层是如何发出声音的？他们能不能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这些值得认真追究的问题在底层文学中都能够看到，并且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在底层文学中可以看到，“关注底层”有时候仅仅是漂亮的哗众取宠的口号，常常与虚伪甚至阴谋联系在一起。迟子建的《炊烟图》写办事员黑眉奉命组织临场几位经常上访的职工去“野炊”，假装是听他们的意

①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②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天涯》2004年第3期。

③刘卫东：《被戏剧化的“溺水者”——论新世纪的底层文学》，《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4期。

④南帆等：《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成为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

见，实际是调虎离山，怕他们在上层领导视察的时候闹事。几位上访户中计，大家其乐融融地野炊完毕后，开始讲述。“黑眉记录着。他记录了些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只要做出写字的样子就是了。”同样是处理底层的表述问题，迟子建选用了温情脉脉的方式，但是，表面上似乎一团和气，却无法融化现实的坚冰。底层的表述受到各方制约，困难重重。

在底层小说中，经常出现一位第一人称叙述者，以他的视角去看底层的生活，《那儿》《我们的路》《马嘶岭血案》都是如此。这个叙述者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和表述能力，同时近距离接触底层，因此成为表达的媒介。贾平凹的《高兴》写的是一个来到西安捡破烂的小人物高兴，出人意料的是，贾平凹选择了第一人称叙事。《高兴》这部小说并未有多少出彩之处，但是贾平凹附在小说后的“后记”却提供了一份关于底层表述的文本。在这份后记中，贾平凹回顾了自己写作《高兴》的经历，谈及刘高兴实有其人，并且还详细介绍了自己与西安城收破烂的底层交往的故事。贾平凹写到，他为了写底层去收集资料，与收破烂的一起吃饭聊天，“本来是以刘高兴的事萌生了要写一部拾破烂的人的书，而我深入了解了那么多拾破烂的人却使我的写作陷入了困境”，原因是刘高兴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每天愁眉苦脸，而是很高兴。贾平凹观察到的情形虽然是个例，他也认为刘高兴是“泥塘里长出来的一枝莲”，但是却为他提供了不一样的材料和观点。

底层文学的叙述者身兼观察者、表述者和思考者多重功能，并且控制着作品的节奏、力度和走向，他们才是底层文学的真正主角。刘庆邦的《卧底》写报社的临时记者周水明为了能够转正，只身到黑煤窑去做卧底，打算写一篇揭露报道，结果反而被识破身份，失去人身自由，险些丧命，后来在清理小煤窑的运动中才获救，最后他却得知自己已经被报社清退。《卧底》中写到了为底层说话的艰难：周水明的原本目的是为矿工伸张正义，但是却屡遭他们出卖，而报社领导明知他去卧底未回、生死未卜，却不积极营救，反而把他清退。在整个事件中，底层仿佛被扼住咽喉，虽死命挣扎却根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连代言人都难以找到。

作家关注和表述底层，但是并不能真正完成“代言”的任务，因为二

者之间尽管可以深度交流，但是达成契合却很艰难。作家和底层之间，依然是一种“双簧”。作家虽然有时候为了了解底层生活做足功课，但是仍然难免在细节上百密一疏。有时底层遭遇读来颇为戏剧化，失去了淳朴感人的真实性。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写一位刚失去丈夫的民间文化研究者到底层去的见闻，她在观测其他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时（如写到的“嫁死”），也治愈了自己的创伤。小说中写到一位女性蒋百嫂帮助煤窑作假，谎称丈夫失踪，却将死去的丈夫的尸体藏在冰箱中。这篇获得好评的小说的瑕疵在于为了文学效果而扭曲了现实，有评论者认为，将丈夫盘腿放置冰箱的细节有悖生活常识。

四、底层文学的意义

考察新世纪底层文学可以发现，底层的生活困境的自然主义描写往往只是小说叙事的背景或动因，其中或隐或现的社会批判才是主要内容，这也是底层文学与以往描写小人物的思潮的差异之处。官员腐败、城乡对立、法制失范等社会问题在底层文学中比比皆是，构成了底层叙事的话题源泉。底层文学虽然是写身边小事，背后却是思想碰撞，直指宏观社会中的“死结”，二者之间形成互文。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对抗像印记一样烙在底层文学的肌肤上，成为醒目的伤疤，也成为底层文学的标志。曹征路的《那儿》以“我”的视角叙述了“小舅”朱卫国的故事，但是背景却是国企转轨中的问题。“小舅”在矿山机械厂度过了下乡回城后的愉快时光，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并且成为工会主席，但是这一切在企业改革后发生了变化，现实中的腐败现象让小舅无法忍耐，进京上访，被遣送回来后因为无颜面对工友而自杀。长在红旗下，历史辉煌的小舅无法适应急促的社会变迁，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失败的“英雄”。国企改革涉及复杂问题，非文学家所能解释，但是“工人阶级”地位一路下滑和腐败丛生等现实却无从逃避。《那儿》强调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平正义的失

落和理想主义情怀在当代的溃败，带有强烈的批判性，而“小舅”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那儿”（英特那雄耐尔）的殉葬和招魂，又使作品充满了悲情。批判色彩尤为浓厚的是，杜月梅最后皈依了基督教，从此由“国家的主人”变成了“上帝的羔羊”，彻底宣告了工人阶级在现实和精神层面的双重破产。《那儿》以饱满的怀旧情怀和尖锐的现实批判，成为底层文学的先声和翘楚，并且催生了底层文学讨论。正是《那儿》中有对“工人阶级”今不如昔的感喟，引起了共鸣，复活了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中特有的“阶级斗争理论”记忆。因此，研究者在关注《那儿》的时候，顺理成章会引起左翼联想。^①不过，联系曹征路的其他作品《霓虹》《豆选事件》《问苍茫》整体考量，并不能认定“左翼传统”是他的一贯追求，但是可以明显看出他对现实问题的敏锐观察和大胆揭示。“左翼传统”是观察底层文学的一个角度，但并不是衡量标准。底层文学涉及当下穷人的生活，几乎都会触及社会批判的内容，只不过是隐显问题，这要根据作品的情况具体考虑。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社会中的所有问题，都能在底层文学中找到影子。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涉及了司法机构玩忽职守的问题、迟子建的《炊烟图》涉及了基层对待上访户的问题、王祥夫的《花落水流红》涉及了农村年轻女孩的出路问题……底层文学中的问题，是现实问题的折射和镜像；底层文学的存在，就是对现实的批判。

关于“底层文学”的作用，作家和批评家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面对现实如实记录，不虚美和不隐恶，既是作家的自我安慰，也是写作伦理的要求。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中说：“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人了解，我就满足了。”张清华认为，底层文学“强化了我们时代的一个关于写作伦理的庄严命题”，“这些作品重要的不是‘对苦难的拯救’，而是‘看见’。我们不能要求苦难的叙述者去消

^①季亚娅：《“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它的力量》，《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